

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重要论述

□ 韩晓青 沈传亮

革命年代产生的分散主义，在建设和改革年代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分散主义的主要表现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和决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鉴于分散主义在革命、建设时期产生过较大危害，至今还没有得到根除，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若干论述，对于牢牢坚持“四个服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分散主义的产生及其危害

分散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了。那个年代，根据地建设相对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独自发展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有利于分散主义的产生。对于分散主义，我们党内早有觉察，并力图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的纪律加以克服。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分散主义不仅危害党的团结，降低党的战斗力、纯洁性，而且对党的事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革命年代，分散主义曾对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如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

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张国焘还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在中央对其多次批评和劝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南下。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给党和红军带来巨大损失。张国焘的这种行径是典型的分散主义。长征后期包括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都对分散主义进行了批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便于管理地方事务，中央采取了大区制，地方权力自然相对较大，后来这一管理体制得以调整。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发现分散主义倾向突出。因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邓小平还梳理过我们党反对分散主义的制度建设情况，指出：“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地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着眼于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在毛泽东领导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

党的事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分散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地位是完全背离的，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损害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因素，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极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

邓小平反对分散主义的主要思想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处于中央领导层，对管党治党有很深入的系统性思考，对于分散主义的危害也有切身体会。他曾多次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党内生活中还存在分散主义偏向，认为“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

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但“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不过这种分散主义的偏向在当时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为1954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

党的八大之后，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出现了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1962年中央召开了扩大了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同年2月6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分散主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严肃的批评。他针对当时党的政治生活指出：“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

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同志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在集中正确的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究竟怎样呢？究竟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更集中，胜利以后前几年更集中，还是这几年更集中呢？应该指出，这几年，形式上比过去集中得多，但在五个统一方面，却不如过去了！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针对存在的这种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这些论述，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认识上来，以便于党中央更好地实现集中统一领导。

在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分散主义的现象，指出：“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针对这种不良现象，他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同分散主义作斗争。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反对分散主义。如他在1988年9月就曾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

重要思想，他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当时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维护党和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全党要严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规定：“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克服分散主义倾向，更加自觉地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不过应该指出，分散主义滋生的客观因素还存在，反对分散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重读经典

用典释义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

【讲话原文】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出处】

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则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东汉）王充《论衡·佚文》

【解读】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是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文学主张。在《论衡·佚文》中，他指出：“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文人写文章，哪里只是玩弄笔墨、堆砌辞藻的呢？其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即记载人

们的行为，传播人们的名声。因为“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好人希望被记载以流芳百世，因此千方百计去做好事；坏人害怕被记载而遗臭万年，因此尽力抑制自己的恶欲。这样，文人的笔就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了。

在《论衡·对作》中，王充还说：“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圣人作经书，贤者写传记，是为了匡正挽救不良的风俗，使老百姓向质朴纯厚的品行转化。而文章要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就必须做到“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这样自陈《论衡》的写作目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疾虚妄”就是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虚假、荒诞现象深恶痛绝，因此著《论衡》以明辨是非、拨乱反正。

王充“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积极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三国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代古文运动中柳宗元提出的“辅时及物”，以及新乐府运动所强调的“匡世济时”，都与这种思想有着血脉联系。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意在告诉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要反映生活，但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要引导人们健康向上，发挥积极的社会功用。

（杨立新）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要目

专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宏观理路
论习近平的领导干部学习观

宋福范
赵朝峰 刘颖

专题·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

作为理解人性和世界方式的情感:复杂性 & 局限性
——基于马克思早期诗作的解读

聂锦芳
彭宏伟

马克思总体性范畴的文本学研究
从宗教批判到社会批判

王建国

——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解答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李彬彬

专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论民主与法治不可分
——“法治中国”的几个基本理念之辨

李德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重构
——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
家国传统与治理转型

王夏昊
刘毅

经济学

供给侧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的特殊及现实意义
——关于金融结构性改革增加融资有效供给

的思考

刘光溪
新型城镇化：基础、问题与路径
论金融发展与就业增长

朱鹏华
高子涵

《老子》：西方人眼中的绿色圣经

□ 邢文祥

“道”相通。克里考特称道家思想为“传统的东亚深层生态学”。美国学者马希尔认为，道家是生态形而上学首造的概念资源，生态思维首次清晰地表达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中国，道家提供了最深厚的、雄辩的、空前详尽的自然哲学和生态感知的第一灵感。雷毅认为：“先秦道家思想蕴涵着丰富的深层生态思想，成为现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先导。”

如何发掘和诠释老子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使其历久弥新、服务现实，是一件兼具价值性和前沿性的工作。王素芬、丁全忠两位教授合著的《生态语境下的老子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在书中，作者从本体论、天人论、认识论、道技论、社会观以及人生观等层面，对老子的生态智慧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全面解读。在本体论层面，道是老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其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道的本源性揭示了生态价值的本体依据，自然性展现了生态世界的存在方式，虚无性表明了生态价值的非功利性，整体性说明了生态世界的多样统一，无私性体现了生态价值的平等性质，回复性蕴含了生态世界的存在之道，实践性展示了生态智慧的深远功效。老子哲学中蕴含的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知足知止的生态消费观、冲气为和的生态和谐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农业观和贵柔守雌的生态女权观，为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极具智慧的哲学参考。

在天人关系上，老子认为万物皆源于道，所以万物平等，“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它同时超越了以人制天和人命天定的不平等的天人观，有助于培育“生态大我”“生态平等”理念，而其中自然即美、自然全美思想则体现着生态审美意识和



情怀。

在认识论层面，老子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有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避免文化霸权；警示人类谨言慎言，所谓“希言自然”“大音希声”；警示人类谨行慎行，善用科技成果，勿妄作妄为，所谓“妄作，凶”。老子的怀疑论思想与作为生态知识观的后现代知识观也很契合。

在道技论上，李约瑟认为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先驱，马克思·韦伯认为《老子》是中国科学自由的宪章。老子反对和批判违背自然的世俗之知、工具之技，主张和崇尚顺应自然的体道之知、通道之技。老子的知识观有助于缓解人类心理和精神危机、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老子的技术观有助于揭示现代工具技术的危害一面及其本质。

在社会观层面，老子反对有为多为、慧智机巧、私心偏狭、贪念欲望、雄强好胜、轻举妄动、战事战争、逞强争霸、喧嚣浮华，主张自然无为、无智无知、无私平衡、知足知止、雌柔不争、致虚守静、哀兵善战、谦卑为下、返璞归真。其中体现的是自然无为的生态思维方式、无为而治的生态政治模式。

在人生观层面，从身的角度，老子贵身重生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生命理念；生死自然思想是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和终极关怀；益生为害思想有助于人们遵循简约自然的生活方式。从心的角度，老子主张尊道贵德，人道遵循天道。曾仕强认为：“几千年来，凝聚中国人力量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道德。”而老子崇尚的守道自然、无私不争、虚静慈悲的圣人人格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是回归物我未分、无知无欲、自然而然的混沌虚空或婴儿素朴状态，它与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物我二分、崇尚智巧、强力强为的做法可谓天壤之别，而与当代人倡导的理性生态人颇为相似。

